

语言文化

姚小平 著



「十讲」的「十」，又有「什」的意思，譬如「什锦菜」、「十样锦」。用于本书的题名，意思就是杂谈，历史、文化、语言、文学样样有。

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语言文化

十讲

姚小平
著

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语言文化十讲 / 姚小平著. —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05. 12
ISBN 7-5600-5267-3

I. 语… II. 姚… III. 语言学—文集 IV. H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057 号

出 版 人: 李朋义

责任编辑: 程 蕾

封面设计: 牛茜茜

版式设计: 李 萌

出版发行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(100089)

网 址: <http://www.fltrp.com>

印 刷: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600-5267-3

定 价: 18.90 元

* * *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

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

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: (010)88817519



姚小平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，1953年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乍浦。著有《洪堡特——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》（1995），《17—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》（2000），译有洪堡特《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》（1997）、《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》（2001），赫尔德《论语言的起源》（1998），编有《〈马氏文通〉与中国语言学史》（2003）等。

 <http://www.yaoxiaoping.org>
yxp@fltrp.com

责任编辑：程蕾 封面设计：牛茜茜 版式设计：李萌

前言

近几年,应邀讲学的机会多了起来。因为专业的关系,我主要是讲语言学和它的历史,讲怎样研究语言、学习外语,但出于读书的兴趣,有时也讲一点别的,如文化史、汉学史之类;或者因为教学的需要、工作的关系,会讲一讲读书学习的方法,以及编辑杂志的体会。日前,看看手边累积的讲稿,已有十多个散题,于是取其整数,汇成一集,取名“语言文化十讲”。“语言文化”这个题目显然泛了些,并且有点俗,可是更妥帖的书名,能够把这十讲的内容总揽起来的,一时又想不出,姑且就用它。“十讲”的“十”,又有“什”的意思,譬如“什锦菜”、“十样锦”。用于本书的题名,意思就是杂谈,历史、文化、语言、文学样样有。

感谢所有悉心倾听、热情发问的朋友!假如有听者反映,哪个方面听不懂,那一定是我没有讲好。再深邃的学理,再玄奥的题目,也应该可以讲得浅显明白,让专业以外的一般人也能听懂。这是一个讲演者应该达到的起码的目标。我愿努力去做。

姚小平

2005年仲夏于北外

目 录

第一讲	学问之道,在乎继承 ——从十部近代名著说起	1
第二讲	语言研究和人文研究中的实证法 ——必要性及可能性	39
第三讲	中西语言学史会通和颖悟	61
第四讲	西洋镜中的汉语 ——17、18 世纪西方人如何认识中国语言文字 ...	81
第五讲	人文主义语言思想家洪堡特	101
第六讲	马相伯的语言观和语法观	125
第七讲	汉英词典面面观 ——词性标注、新词新语及其他	135
	What I can tell of a 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 ...	147
第八讲	编辑工作漫谈	165
第九讲	略谈研究生论文 ——“全国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论坛”发言 ...	179
第十讲	我的外语,我的路	187
后记		217
附录《游学琐记》		221
索引		303

学问之道,在乎继承

——从十部近代名著说起^①

引子

今天的题目,其实主要不是听我讲,而是听古人讲。我请来了宋代以降、截至清末的一些个名家,让他们来给大家说说怎样读书和做学问,怎样树立一种良好的学风。而在展开这个题目的同时,大家顺便也会看到某种可以称为“脉络”的东西,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怎样延续、发展起来的。但凡讲学,都有宗旨^②,我这一讲要申明的大旨,就是古今学问之道具有一统性、连续性,古人求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发扬,治学的方法可供我们借鉴。

“近代”是一个含混的概念,在这里我就用它来指宋代至清末。为什么要从宋代开始,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呢?因为,我觉得宋代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批评史上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时代,那时出现了所谓“理学”,不但阐发抽象的哲学观念,“心”、“性”、“理”等等,提出从宇宙发生、事物本原一直到经纶学理、人生意义等一整套理论,而且开始从治学方法、问学态度、学风学德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学术史进行反思。中国学术的核心部分成形于先秦,以后绵延不绝,至宋代已经承传了千把年。一千多年的漫长历程,足以使这一内

语言文化十讲

① 本稿的主要内容曾于2000—2005年间先后在复旦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广西师范学院、沈阳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、河南大学、山东师范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、黑龙江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、上海大学等校,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日本语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(简称外研社)编辑沙龙上宣讲。讲稿曾连载于《新视野》(外研社社刊)2003年第4、5、6期。

② 黄宗羲说:“讲学而无宗旨,即有嘉言,是无头绪之乱丝也。”(《明儒学案》凡例)

核被裹上一层又一层的外皮。本来只不过是十来部经书，即通常说的“十三经”^①，正文大约63.5万字，也就合今人一部厚一点的书，似乎可以穷尽。但由于时代更易、社会变迁、语言演化、文本讹讹等多种原因，其中有些较早的作品，在战国末年的人读起来已经不好懂，于是，汉初学者的第一要务就是给它们做注解。汉代产生了一大批经学家，主要任务是注释经书。他们的方法是严谨的，注重一字一义的考订，从文字到文本，然后阐明义理。他们的态度是认真而科学的，像扬雄作《方言》，立足实地勘考；像许慎编《说文》，力求“信而有征”；像班固写《汉书》，主张“实事求是”。后来人们就把汉代这种特点的经学研究称为“汉学”（如今说的“汉学”，泛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、语言、文化的研究，意思完全不同了），用现在的说法，就是比较具有实证的精神。

汉以后，由于佛学的影响，中国学术一定程度上被拉向非实证的、虚玄的方向，由是产生了魏晋玄学，崇尚“三玄”，即《庄》、《老》、《易》。玄学“贵无”，比如魏·王弼有“以无为本”之说，以为造化万物都起源于“无”，当然最终也归于“无”。这要是在今天听起来，好像还蛮科学的；根据“大爆炸说”（Big Bang Theory），宇宙有一个始点，大概距今150亿年，而在这之前就是“无”，连时间都不存在。可是作为一种哲学观，“贵无”论在当时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却不怎么好，酿成了“清谈”之风，而且对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。因为，如果是“贵有”，比如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，认为万物源于某种实在的元素，那么就

^① 按照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（清人阮元主校），“十三经”依次是：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。除《尔雅》外，余者都是先秦作品。《尔雅》是一部辞书，约成书于西汉初年，定稿者无可考，但语汇的搜集工作想来也始于先秦。“十三经”是后来的说法，汉武帝时只提“五经”，即“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”。或再加上“乐”，称“六经”。

会促使人们去探索自然。可是如果“贵无”，源于空而又归于空，还有什么值得探索的呢？^①不过，另一方面，先秦经籍的诠释终究是在继续，这类文献学的工作或多或少需要有一种实学求是的态度。而先秦学术的内核，正是在这种亦虚亦实的、矛盾着的进程中被越裹越厚，体积越来越大。光有“笺”、“注”不够，还要有“疏”，即对注释作更详明的注；或是“音义”，连注音带解释；或叫“正义”、“义疏”，等等。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极重要的一个部分，用现代一点的术语，可以称为“解释学”。当然也有大量独立的创作，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先秦经书的基础上做义理的发挥。就连玄学，表面看来背离了儒家学说，其实也离不开先秦的“三玄”，所以，可以说也是一层“皮”。

总之，到了宋代，中国学术已经滚成了一个巨大的雪球，要想深入至它的内核，很不容易了。加上来自科举的重压，似乎一个读书人不走功名这条路，就难有出息，学人普遍感到学问不好做，难乎为继。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反思，毛病究竟出在哪里？怎样才能把学问做得更好，做出新意来？下面我们就从二程、朱熹读起，看看他们的思考是否与此有关。

一、程颢、程颐《二程集》

二程是兄弟俩，都做过不小的官。哥哥叫程颢（1032—1085），号明道先生；弟弟叫程颐（1033—1107），号伊川先生。两人的秉性不大一样。哥哥比较随和，跟人意见不合时就说：

① 冯友兰说，古希腊哲学家认为“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”，而中国哲学家的看法正相反：“为什么有这种不同，就因为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，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。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，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。”（《中国哲学简史》22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）

再商量；而弟弟却直言：这不对。可是终究是兄弟俩，名字又接近^①，于是作品有时也分不太清究竟为哪一位所作，明清时有人索性把他们的著作合起来，编为《二程全书》。至于二人的哲学思想，学术史家的看法很有出入。有人觉得，二程之学无大区别（杨东莼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^②）；有人则说，程颢创下“心学”派，由陆九渊、王守仁继承下来；程颐则是“理学”宗祖，继承者是朱熹（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）。这意味着，兄弟俩各创了新儒家的一派。简言之，朱熹认为心外有理，理是客观存在；陆、王则认为，心外无理，心就是理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朱熹是客观唯心，陆、王是主观唯心。了解一点哲学源流，对我们研读那个时候的作品有好处。当然，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哲学，而是要看看二程关于治学有哪些论述。

我想用四个小题目把二程的话归拢起来：

1. 求学自然

学者须敬守此心，不可急迫，当栽培深厚，涵泳于其间，然后可以自得。

性静者可以为学。

学至于乐则成矣。

2. 求学勇进

人之学不进，只是不勇。……学者所见所期，不可不远且大也。及夫施于用，则必有其渐。……今之学者，如登山：方于平易，皆能阔步而进，一遇险峻，则止矣。

① 有个小窍门，可以让大家很容易就记住哪个是兄哪个是弟。其实，“颢”就是大的意思（“颢然”、“颢颢”，都指浩博盛大的样子），发音的时候，嘴巴张得也大（这在语言学上叫做语音的象征性）；“颐”字虽然未必有小的意思，但发音时开口度很小，嘴巴张得也小。所以，程颢是哥哥，程颐是弟弟。

② 北新书局，1932年。今本有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，《民国学术经典文库》之一。

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,是不然。且一月之中,十日为举业,余日足可为学。然人不志此,必志于彼。故科举之事,不患妨功,惟患夺志。

3. 实学求是

有实则有名,名实一物也。若夫好名者,则殉名为虚矣。

学而为名,内不足也。……学始于不欺暗室。

君子莫进于学,莫止于画,莫病于自足,莫罪于自弃。

4. 善学、会疑

为学三年,而不至于善,是不善学。

学者要先会疑。

君子之学贵一,一则明,明则有功。

我们没有可能把每一句话都拿来赏析。只说说我自己的一点感受。

“求学自然”的意思是,为学者要不急不躁,顺应自然。尤其在一个人文学者,前期积累极为重要。早期的学习应该只是为学而学,很自然地学,而不是为了某个实用的目的去学。把视野开拓得广一些,基础打得厚实些,对以后的研究大有好处。早年所下的工夫,一时上看不出来,久之则能见出分晓。可是如今的学校,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,以至硕士、博士,专业分得很细,学制又步步紧逼。这是学术进步的反映,也是时代发展所使然,然而对学者人格的塑造却有不利的影响。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如此之快,让人很难“敬守此心”,像从前的学者那样对自身做深厚的栽培。而没有前期的自我修为,只有按部就班的专业训练,日后虽有望成为一个专家,却难以成为一个大家。

“学至于乐”,是求学自然的必然境界。读书问学之始,若是

难免的。然而，倘若读书有年，问学半世，还总感到苦，甚至逢人就说苦，就很不正常了。读书是为积攒功力，也是为寻求乐趣，如果只是为前一目的，时间一长便会觉得苦。自来学问能成一家者，都是性情中人，学问在他们是自然的发挥，是合于天性的施展。比如钱钟书，他也不管别人做什么，不跟人家合流，只是读自己想读的书，做自己想做的学问。清人章学诚说得好：“夫学有天性焉……学又有至情焉”；“功力有余，而性情不足，未可谓学问也。性情自有，而不以功力深之，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》，下面有专门一节讲这部书。）学问的最高境界是“乐”，这个思想的源头很早，可以追溯到先秦。例如《论语·雍也》里面说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

当然，顺其自然并不等于怠惰懒散。像二程说的，想使学问进上一步，得要“勇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下一节朱熹有更生动的说法。

古今世界大不相同，可是很多事情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比如二程说，“科举之事，不患妨功，惟患夺志”，这句话在今天也还是可以听的。“科举”无非就是功名，在今天则是学位、证书之类。这类东西你让一个读书人一点都不要，那不现实，因为它们直接涉及经济利益，决定着能不能觅到一个像样的饭碗来支撑自己想做的学问。但如果醉心其中，以为有了这些就是入了学问的佳境，就是本末颠倒了。又如“有实则有名”、“学而为名，内不足也”等句，在今天也完全适用。君不见，如今学界有多少人空名远播，有多少人偏好挂名？都是因为内不足以自养，才会有逐名之举。

二、朱熹《朱子语类》

朱熹（1130—1200）这个名字，跟我们说的“四书五经”的“四书”常常联系在一起。他作过一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四篇作品，就是从 he 那时候开始合称“四书”，被官方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。

朱熹是一位难得的大学问家，胡适对他评价极高，说：“朱子在宋儒中地位最高”，“真正受了孔子的‘苏格拉底传统’的影响，所以立下了一套关于研究探索的精神、方法、步骤的原则。”^①“孔子的‘苏格拉底传统’”——这句话听起来好不奇怪：两位圣人相隔万里，毫不通气，何以会有瓜葛？其实胡适指的是“会疑”的精神，如《论语·为政》里说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”，《孟子·尽心下》里说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，等等，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里一种值得光大的传统。至于胡适说，朱熹有一整套“关于研究探索的精神、方法、步骤的原则”，要了解这个我们就要去读《朱子语类》。这是一个大部头，多达140卷，可是不但不难懂，甚至可以说很容易读，因为那里面全是朱熹平常讲的话，也即宋代的白话，由门人弟子笔录下来。我们会发现，很多话跟我们今天说的话区别不大。下面仍按内容归分，共八节，标题都是我拟的。

1. 立志向学，锐意进取

人多言为事所夺，有妨讲学，此为“不能使船嫌溪曲”者也。遇富贵，就富贵上做工夫；遇贫贱，就贫贱上做工夫。

学者立志，须教勇猛，自当有进。志不足以有为，此学者之大病。……学者悠悠是大病。今觉诸公都是进寸退尺，每日理会些小文义，都轻轻地拂过，不曾动得皮毛上。……人生能得几个三五年？须是自强。

人之为学，当如救火追亡，犹恐不及。如自家有个光明宝藏被人夺去，寻求赶捉，必要取得始得。……人精神飞扬，心不在壳子里面，便害事。

如今学者谁不为学？只是不可谓之“志于学”。

或谓科举害人。曰：此特一事耳。若自家工夫到后，那

① 见胡适《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》第四节，姜义华主编《胡适学术文集》中国哲学史部分558—559页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。

边自轻。……科举累人不浅，人多为此所夺。但有父母在，仰事俯育，不得不资于此，故不可不勉尔。其实甚夺人志。……程先生有言：“不患妨功，惟患夺志。”若一月之间著十日事举业，亦有二十日修学。若被他移了志，则更无医处矣！……非是科举累人，自是人累科举。

本节要是用一个字来概括，仍是一个“勇”字。二程学求勇进的精神，由朱熹继承了下来。我们看他用的那些个形象的比喻，救火、追逃犯、抢回自家的宝藏等等，一句话，为学需要有一股锐气。在朱熹的时代，社会上已是学者若云、良莠难辨，因此他才有“为学”者多、“志于学”者少的感叹。

“非是科举累人，自是人累科举”，这是至理名言！对古今中外的很多考试制度都可以这样来认识（比如现在流行的四六级英语考试，只要英语学到了火候，不会觉得它累人，可是如果英语基础本身就不好，只是为达标、为证书而去考，成天围着考题转，那就很累了）。当朱熹说，他参加科举，是因为“有父母在，仰事俯育，不得不资于此”的时候，我想他说出了当时很多读书人的心里话。不过，他是成功者，19岁上就中了进士，所以，当他说“科举累人不浅”、“甚夺人志”这类话的时候，在绝大多数未能登第者听起来，简直就是现成话、风凉话呢。他又说，善为学者，无论贫富都能做工夫。这“贫富”二字，似乎不单是指财富的多寡，而且还指时间的有无。如今常听得人说：“忙！没时间读书。”或者“事多！没时间做学问。”这就是“不能使船嫌溪曲”了。其实，在一些人，这样的话只不过是遁词罢了，就是放他一年假，怕也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来。很多事情，都在人为呵！

2. 求大规模

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，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。今人多未曾知得个大规模，先去修治得一间半房，所以不济事。

学须先理会那大底。理会得大底了,将来那里面小底自然通透。今人却是理会那大底不得,只去搜寻里面小小节目。

学问须是大进一番,方始有益。若能于一处大处攻破,见那许多零碎,只是这一个道理,方是快活。然零碎底非是不当理会,但大处攻不破,纵零碎理会得些少,终不快活。

本节说的**问题**,在一个初学者可能感觉不到。总要等到入了门,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,才会意识到。我们做学问,好像到了一定程度,就会感到做不开,做不大了。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想过这个问题。但我自己的确想过,而且现在有时还在琢磨。在一个学者,学问不能“大进”,做不出一个“大规模”,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我觉得,在这一点上做学问跟做生意有点儿像。一个经商者,或者企业家,如果他是个怀有大志的人,就不会满足于一点小本生意,总想着要把生意做大,才能“快活”。为学也是这样。当然,我们也可以守着一个**小摊子**,做一点**短钉学问**,可那是**规规小儒之举**,不是有**大志向者**所为。而要想有大作为,用朱熹的词儿来说,就得建立一个大大的“腔当”。这个大腔当是指什么呢?似乎是指要考虑一些大的问题,力求把握学术的大端,但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及早制定一个像样的规划?

上面我拿做学问跟做生意来比,说二者有相似之处。当然也有不像的一面。比如说,做生意,后人总是超过前人,越做越大。可是做学问,好像后人总是超不过前人,越做越小了。这是为什么?这一点也使我感到困惑。

3. 小处着手

学者**贪高慕远**,不肯从近处做去,如何理会得大**头项底**!

如洒扫**大厅大廊**,亦只是如洒扫**小室模样**;扫得小处**净洁**,大处亦然。若有大处开拓不去,即是于小处便不曾尽心。……小者便是大者之验。

小立课程，大作功夫。

学问须严密理会，铢分毫析。……愈细密，愈广大；愈谨确，愈高明。开阔中又著细密，宽缓中又著谨严。

刚才朱熹说，为学须奔一个大目标，可是这里他话头一调，又告诫学子要从具体的事做起。“小立课程，大作功夫”，这个道理听起来再简单不过，可是真正做到却不容易。因为，人都有喜新猎奇的习惯，往往一个小题目未做透，又被另一个题目吸引了去。结果是哪一个都做不好。可能这也是古往今来学人的通病，否则也不会传下来“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学者以多方丧生”（《列子·说符》）这样的警言。在一个学者，理想的情况想来应该是：一方面把若干具体的题目做得比较透，另一方面也能着眼宏观，把握大的题目。可是怎样才能处理好微观与宏观二者的关系？怎样来把自己的学问做成一个合理的布局？这是一个难题。

4. 循序渐进，下学上达

学不可躐等，不可草率徒费心力，须依次序，如法理会。一经通熟，他书亦易看。

问学如登塔，逐一层登将去。上面一层，虽不问人，亦自见得。若不去实踏过，却悬空妄想，便和最下底层不曾理会得。

如做塔，且从那低处、阔处做起，少间自到合尖处。若只要从头上做起，却无著工夫处。“下学而上达”，下学方是实。……下学者，事也；上达者，理也。须是下学，方能上达。

读完“小处着手”一节，再来读这一节，便有顺理成章之感。“下学而上达”，这一句出自《论语·宪问》（前半句是“不怨天，不尤人”）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。

5. 一以贯之

却如人有一屋钱散放在地上，当下将一条索子都贯穿